在中共官方的叙述中，毛泽东的名字总是与一场又一场辉煌的胜利相联系，在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指引下，中国逐步走向一片生机、无限光明。但不知怎么的，在伟大领袖的最后十年，难道是突然的老迈昏花，情况霎时急转直下，“十全武功”只得三七开过。官方叙事的断裂之处令人疑惑，使得那些毛忠实的支持者们，甚至要连官方盖章的“十年浩劫”一并肯定不可。

真相隐藏在帷幕之后，不为人注意的角落，高华以十余年的精力，依凭公开史料，搜寻史料，串联起为官方所避讳的蛛丝马迹，孤明独发，写就这本至今唯一的全面研究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著作。正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历史的逻辑所在，发生的即合乎理性。“到了不再偏执的未来，也许他将进入华夏先烈之列——他们为国效力，功勋卓著，但不见容于最高统治者。当他们腐坏的政敌早已灰飞烟灭的时候，他们的英明将永远长存，受人景仰”，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写给赵紫阳的这段话，也适用于高华，“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属不幸之万幸哉！

毛泽东政治活动的主轴，一切的最终归因，是对权力的追求，从这一点出发，才能理解毛的种种举动。在党内，毛泽东不仅要做至高无上的领袖，还要做“中国的列宁”，思想理论的合法性来源；在党外，毛泽东要领导中共打败国民党，夺取全国的政权，成为新的独裁党。毛泽东的优点与缺陷，大都围绕着他对权力的追求展开。

毛泽东在夺取权力的道路上，其手段要远比他的竞争者们高明。首先，对于党内的同志来说，毛最初的独特优势，是他军事上的才华，正是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突破了蒋介石的封锁，保留了有生力量（中共党史教科书中将遵义会议描写为毛泽东掌握大权的开始，其实这场会议只是使毛泽东在中共最高决策、指挥系统中首次获得发言权与决定权，离党、军的“最后决定权”尚远，不久之后的“会理会议”也常被忽略，正是在此次会议上毛取得了对军权的控制）。军事上的胜利是毛原始的资本，但共产党毕竟是在理论的指引下凝聚起来的团体，要成为党的领袖，必须要在思想上掌握控制权。

在中共初期的较长一段时间内，党内思想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以王明、张闻天、博古为首的“留苏派”，他们自诩掌握了共产国际的正统，将苏联经验奉为圭臬，亦步亦趋。“留苏派”的“红色教授”们一开始瞧不起“土气”的毛泽东，毛泽东也始终痛恨这群“教条主义宗派”。王明他们虽具有意识形态理论上的先发优势，但却并无一人可与毛泽东相比较，既不能领兵打（胜）仗，在战争时期权力基础本就虚弱，思想上又充满僵化，搞不出什么创新。毛泽东以极高超的政治手腕，拉拢一批人打击另一批，从政治上一步步瓦解“留苏派”的势力。可以说，早在1942年之前，王明等人已无与毛争锋的可能。毛此时已经是党内同僚中的第一人，但毛不满足于此，他要做至高无上的领袖，他的真正敌手是苏联的影响。

谁控制了马列经典的解释权，谁就控制了党的意识。毛泽东找到了取得意识形态解释权两大法宝。一是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打着这个旗号，毛便可名正言顺地施行有别于莫斯科正统的“异端”想法；二，毛泽东深受《联共党史》为维护斯大林一贯正确形象，任意剪裁历史，以文字形式重塑党的正确记忆的启发，推出了《联共党史》的中国版——《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只有毛才是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

光有思想的原材料可还不行，还要将党内原来的所有其他思想一并清除（包括五四的民主、自由），确立起“新解释”唯一的至尊地位，为党注入“领袖至上”“个人渺小”的新观念，彻底改造中共。具体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正是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在中共建政之前集中体现了毛与共产党体制极为恶劣、罄竹难书的一面，无疑是后来大大小小各色“运动”的预演。1942年初春的“整顿三风”俨然与后来反右的“百花齐放”根出同源，“引蛇出洞”早已有之；冻结中央政治局，以新创设的中央总学委作为领导整风运动与全党工作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明显与大名鼎鼎的“中央文革”师出同门。整风—审干—抢救（反奸肃反）步步深化，由文到武，再文武互用，交替使用思想感化和暴力震慑，逮捕、审问、酷刑，“通、供、信”，其中具体情形之悲惨，笔者不忍复述。到了1943年春夏之际，延安三万多党、政、军干部全部被卷入，一片肃杀的气氛弥漫于延安，“特务”、“叛徒”、“内奸”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多。毛泽东一贯夸张化的“革命浪漫主义”尽显无疑，讽刺的是，据唐纵日记所载，此时的国民党在延安根本没有一个内线。

延安整风即将收尾之时，王稼祥、刘少奇适时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在中共七大上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中共党史体系得以最终确立。毛整肃内部，重建新权威的努力一路凯歌。终于，“红太阳”升起了，毛泽东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后来，毛又将这套用之于全国，发动起一场场运动，不仅给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将毛捧上神坛的刘少奇等人也不能幸免，正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在共产党历史上，运用“整肃”的方式来实现权力的最大程度集中，并不是毛的首创，斯大林早已对此做出独创性的“贡献”。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处，在于其不直接采用大规模处决（吸取早年“打AB团”的教训），更为注重从思想上彻底的改造，这真是毛对国际共运的一大“贡献”。值得注意的是，此般类似于狂热宗教分子清除异端的举动，在列宁式共产党的历史上甚为普遍，毛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可以说，即使没有毛泽东，中共也一定会发生自相残杀的惨剧，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共产党的性质。

在共产党特性的塑造过程中，列宁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列宁将原设想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的马克思的理论体系，改造移植到了俄国，实际上成了引导后进国家现代化的理论，从根本上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可以说，从列宁开始就是所谓的“修正主义”了。在对马克思理论的灵活运用这一点上，斯大林和毛泽东可谓深得真传，与苏联相异的“农民党”“土地政策”之类，不过是毛依循着列宁的道路的二次甚至三次创造罢了。分明是落后国家的兴奋剂，却被宣言为比资本主义还要先进，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割裂的直接后果是巨大的虚伪，使那些“传统”的罪恶以新的面目重现。无产阶级是不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尚不得知，但五四运动的最大成果，共产党倒的确是五四民主、自由思想的掘墓人。

或许用吉拉斯的话来结束最为合适，“虽然这个新阶级完成了革命中最伟大的一次胜利，但其统治方式却是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篇章。”